

玉帛干戈

世界

十大

外交家

陈潮 胡礼忠 主编

YU BO GAN 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玉帛干戈

世界 十大 外交家

陈潮 胡礼忠 主编

YU BO GAN 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界“十大”名人传记系列丛书

玉帛干戈 ——世界十大外交家

丛书主编	朱尔沛 李国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分册主编	陈 潮 胡礼忠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责 编	江建忠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 本	850×1092 1/32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印 张	6.25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插 页	4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1,000	印 数 8,000

ISBN 7—5325—2127—3/k·227

定价: 9.30 元

《世界“十大”名人传记丛书》

编委会

•

主编

朱尔沛 李国章

•

副主编

侯维瑞

•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尔沛	朱煜善	江建忠
李国章	张晓敏	陈云生
胡礼忠	侯维瑞	高海航

编者絮语

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许多卓越人物，他们凭借各自的天赋、环境和机缘，作出了超常的努力，也成就了不凡的业绩，在人类前进轨迹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为全人类留存下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后继的人们在新的历史轨道上迈进时，回顾一下这些已逝的先行者的经历、事迹、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借鉴，可以淬砺自己的智慧，鼓舞自己的勇气，增添自己的文化的、历史的底蕴。

于是有了编撰这套“世界十大名人传记系列”的设想。

“世界十大名人传记系列”各册，按事业特征而划分，已经列目的有探险家、美术家、科学家、外交家、文豪、帝王、音乐家、思想家、企业家、军事统帅等；入选人

物又以其在世界(中国除外)和各自领域中的成就、影响为标准,兼顾历史时期、地域的相对平衡,加以调整选编而成。

这些在选的名人,有的赴危涉险,闯入未可知的天涯海角;有的苦心孤诣,驰骋于幻迷的色彩音符之间;有的孜孜不倦,探索宇宙的无穷奥秘;有的纵横捭阖,把玉帛干戈漫撒人间;有的精思妙想,点燃起睿智的火炬;有的雄姿英发,在血火苍穹中稳操胜券;有的惨淡经营,构筑起一个个实业、金融的王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人的业绩,就是后人的明鉴。

二十一世纪的大门将在人们面前打开,当大家朝向新世纪拼搏奋进时,回眸前人留下的足迹,品味前人的得失甘苦,将会得益非浅。愿每个阅读过“世界十大名人传记系列”的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教益,是拿来也好,是借鉴也好;是策励也好,是警戒也好;都将能为人们在新世纪里高歌猛进增添一份激情!

前

言

陈
潮
胡礼忠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也就有了外交。从古代希腊、罗马到中国的汉、唐，从中世纪政教冲突、君主割据，到20世纪全球范围的多边外交，人类进行了无数次的外交活动，造就了太多的巧言善断的外交家。我们熟知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和罗马帝国的独裁官凯撒，他们不仅是天才的军事家，也是天才的外交家。差不多同时期，汉朝的张骞和苏武先后奉命出使，北入大漠，滞留一二十年，历尽艰险，建立伟绩。在更早的年代，中国的纵横家张仪、苏秦之辈，以如簧之舌推动历史的巨轮，更为后人赞叹不已。在欧洲，中世纪的拜占庭外交、教廷外交、君主割据外交，无不披着一层神秘可怖的面纱，但作为权谋外交家，代表宗教政治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和代表世俗政治的法国

宰相黎塞留，又无疑给人们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只有到了17、18世纪，国家利益才开始在国际交往中被置于首位，国际外交才真正开始具有世界意义。直到这时，才出现了诸如“政治均势”、“天然边界”、“海上自由”、“国际条约不可动摇”等崭新的政治和外交概念。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府郑重宣布：对内对外政策将贯彻民族至上的新原则。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有重大变革意义的。这时候，资本主义英国早已确立了在海上的霸权，法国则已经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了外交通用语言，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开始了一个以国家至上、殖民扩张、争霸世界为特征的外交新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因此，我们不妨就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作为本书人物的时代上限，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下限，按照历史进程及其代表性来选择本书有限的十个外交家。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60年代，法、英、奥、俄四国曾交替支配着国际外交。这时期的法国，两度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涌现了像拿破仑和拿破仑三世、基佐、梯也尔这样的出色的外务活动家，但比较起来，活跃于大革命时代、拿破仑时代、波旁王朝复辟时代和七月王朝时代以折而不倒著称的现实主义职业外交家塔列兰，却是最富传奇、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与塔列兰差不多同时代的奥地利首相兼外交大臣梅特涅，也是个不可不写的人物。他以纵横捭阖的“均势外交”，使一个屡战屡败的奥地利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了欧洲的政治中枢和外交中心，梅特涅也因此奠定了其19世纪“均势外

交”开山祖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时至今日,美国的基辛格还对他极尽推崇效法之能事。梅特涅的外交证明,坚强的国际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实力,有时更取决于智慧。

从60年代中叶起,法国外交的国际影响即已削弱。在此前后迅速崛起的普鲁士,却以战争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从而使世界上出现一个强大的德国。1871年普法战争的结束和法国巴黎公社的失败,拉开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新老列强重新分割世界的序幕。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是以铁血宰相著称的俾斯麦,他在外交策略上继承了梅特涅的衣钵,加上以资本为后盾的铁血政策,自然成了全德意志的代表。再看看东方大国俄罗斯,自从18世纪彼得大帝成功地解决了波罗的海沿岸问题后,俄罗斯的外交在欧洲占有特殊地位。到19世纪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的国际影响达到了顶点。但俄国沙皇的外交家形象与前者相比,仍稍感逊色。

日本的后来居上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崛起于旧殖民主义时代行将没落、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分割世界已经开始的19世纪90年代。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相邻而居的国家,曾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但它通过明治维新,开展自强外交,逐步废除了套在脖子上的不平等条约,成功地摆脱了被侵略、被压迫的地位,转而推行对外扩张的殖民炮舰政策。它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取胜后,成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人们熟悉的伊藤博文,正是这种从自强到侵略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推行者。与日本情况相似的早期中国,无论政治和

外交,都走了一条失败的道路,通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代历史,实在找不出一个称得上世界级的外交家。所以我们宁愿入选一个日本上升时期的代表人物,以使读者能在对比中得到一些启发。

19世纪是英国殖民主义外交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时期。这时期的大外交家,不仅有以提出推行“不干涉主义”而奠定英国外交政策基石的卡斯尔莱和坎宁,还有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均势外交家狄士累利。但我们还是选择了与东方及中国问题密切相关的殖民外交家代表帕麦斯顿。帕麦斯顿曾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所有的是永久不变的利益。”这一名言直言不讳地道出了那个时代殖民主义外交的真谛。

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殖民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那么20世纪则是美国霸权主义崛起的时代。年轻的美国在19世纪还无力在欧亚大陆与英法等老牌殖民强国竞争,但它在1823年提出著名的“门罗主义”,把拉丁美洲划入自己势力范围,不许他国染指。1898年美国在菲律宾战胜西班牙,随即高举着“门户开放”的远东外交战略跨入了20世纪。之后,先有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外交”,继有塔夫脱的“金元外交”,后有威尔逊的“人权外交”。随着世界的进步,“大棒”渐渐失去光彩,“金元”却充满魅力,“人权”则日益成为王牌。本世纪上半叶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即凭藉雄厚财力,分别以一战后的“道威斯计划”和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将势力扩展到全世界。在二战以后的冷战时代,美国又频频在国际事

务中打出“人权”王牌。因此,作为“金元外交”和“人权外交”的开创者,塔夫脱和威尔逊确实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把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两次大战改变了原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战后先后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西方对抗的两大阵营,从而引起和加深了殖民主义体系的危机,还导致新的国际外交形式的出现,这就是一战以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和二战以后成立的联合国。其间,一批举世瞩目的外务活动家纷纷登场,除已经提到的人权外交家威尔逊外,还有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白里安、英国首相鲍尔温、丘吉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国务卿马歇尔这样的头面人物。此外,一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均衡高手施特莱斯曼,以及致力于摆脱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的土耳其领袖基马尔,也十分引人注目。遗憾的是,他们或已被作为“大政治家”收入另册,或受本书名额的限制而只好被割爱了。

为了能反映读者比较熟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的另一幕,我们选择了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作为德、意、日法西斯外交的代表,这个外交史上少见的戏剧性人物,将令人大开眼界。我们还挑选大名鼎鼎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以期从一种失败外交的角度,看看绥靖政策是怎样葬送了一个时代。苏联外交家莫洛托夫是十分重要、也是极有特色的。莫洛托夫漫长而起伏的政治和外交生涯,有声有色地展现了本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活动,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后的外交铁幕。

以上便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基本思路,尚祈方家不吝指正。全书由我们进行通稿、定稿。倘若这本读物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能给青年朋友一点什么启示,那将是编者莫大的欣慰了。

目 录

前言

- 1 塔列兰
- 20 梅特涅
- 39 帕麦斯顿
- 57 俾斯麦
- 75 伊藤博文
- 92 塔夫脱
- 107 威尔逊
- 135 张伯伦
- 153 齐亚诺
- 169 莫洛托夫

塔 列 兰

王
圣
良

在 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政治舞台上,有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纵横大师。他虽然是个跛脚,却圆滑机警,权变多诈,俨然是个政治上的不倒翁。在当时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岁月中,无数的政治家或人头落地,或亡命国外,他却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除了短期流亡和下台外,总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先后为六届法国政府所重用,担任了外交部长、外交大臣直至总理大臣等要职。作为外交大臣和政府总理,他一方面充分施展个人的外交才能,以娴熟手腕巧妙地利用敌国之间的矛盾和谈判对手的细微疏忽,为法国赢得了难以计数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惯于见风使舵的变色龙,人称“向日葵”,总是在他的主子行将垮台之际把笑脸转向未来的胜利者。在无数

次的政治风暴中，他支撑着他的瘸腿，平衡着法国，平衡着欧洲，同时也平衡着他自己。这个人就是近代法国著名的外交家夏尔·莫里斯·塔列兰 (Charle Maurice de Talleyrand)。

1754年2月2日，塔列兰出生在法国巴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的祖先从10世纪卡佩王朝建立时就已经是宫廷显贵了。按血统来说，他的父亲与国王路易十六还是表兄弟关系。

虽说塔列兰是个贵族子弟，他的童年却是不幸的。他的父母是当时法国上流社会中的活跃分子，整天忙于应酬，塔列兰出生不久就被寄养在巴黎近郊的奶妈家中。两岁那年，他不慎从高柜子上摔了下来，摔坏了右脚，成了一个终生只能借助拐杖走路的跛子。于是，父母对他更加漠不关心了，转而又把他寄养到外省的一个亲戚莎莱夫人处，然后再送往寄宿学校。年幼的塔列兰就这样离开亲生父母，来到了陌生的新天地，孤苦伶仃，从此难得与家人在一起生活。

身体残疾、又得不到父母爱心的塔列兰自幼就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性格孤僻，终日独处。12岁那年，塔列兰染上了天花，父母竟一次也没去探望他，也不接他回家养病，只让佣人把他送到奶妈家，病愈后又送回了学校。15岁时，塔列兰再次遭到精神打击。当时塔列兰的哥哥患病夭折，按理作为次子的塔列兰自然就成了长子，可以承袭父亲的爵位和财产了。可是他的父母却剥夺了他的长子继承权，硬是把他送进了圣·秀尔比斯神学院，学当

一名神甫。在神学院的5年时间里,郁郁不得志的塔列兰更加沉默寡言,一天到晚消磨在图书馆,埋头书堆。当时能够找得到的书籍,包括卢梭、伏尔泰的启蒙作品,他都浏览过。从这些书中,塔列兰小心地选择自己所需的东西,渴望摆脱贵族家庭和天主教会对他的束缚。

1774年,年届弱冠的塔列兰终于从神学院毕业了。不幸的早年生活,虚伪的神学院教育,已经把他造就成为一个冷酷无情、极端自私、见风使舵的人。第二年,他获得神甫称号,开始踏上人生之旅。就在这一年,他遵父嘱参加了路易十六的加冕典礼。大典之后,路易十六给了这位表侄一个兰斯市圣雷米修道院院长的美差。从此,塔列兰成了法国上流社会的一员。1788年12月,路易十六又任命他为奥顿区的主教。

这位主教大人可从来不是上帝的虔诚信徒,而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无神论者。他披着黑法衣,不顾自己的身份,吃喝嫖赌,与贵妇人谈情说爱,还到交易所大搞投机生意,到处捞钱。他的贪婪、卑鄙也就从这时起开始出了名。就在塔列兰尽情地享受巴黎上流社会花天酒地的“甜蜜”生活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堡垒的巴士底狱。贵族塔列兰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强大的革命力量必然会埋葬腐朽的封建王朝。他深知要避免成为封建王朝的殉葬品,就只能赶快抛弃它,跻身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于是进行了他政治上

的第一次转向，背叛了他所属的第一等级。

1789年夏秋之际，法国革命政权制宪议会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塔列兰看到机会来了。10月10日，他以奥顿区主教的身份出席了制宪议会关于如何处理教会土地的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用没收并拍卖教会土地的方法解决危机，但又怕触及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原则。这个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塔列兰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教会占有大量土地而又不纳税，呼吁把教会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拍卖，解决财政危机。塔列兰强调说，没收教会土地根本不会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因为教会土地不同于世俗人的私有财产，本来就是属于全体信徒，也就是属于国民的，因此国家有权收回。塔列兰的发言打动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心。制宪议会最终通过了“教会土地由国家处理”的决议案。就这样，塔列兰以教会人士的身份，把教会土地献给了国家，一下子成为巴黎市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称塔列兰为“人类灵魂的牧羊人”，并深深地为他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善良的人们当然不会知道这位第一等级叛逆者的内心想法的。

从此，革命阵营开始信任起用塔列兰。他一跃成为革命的大红人，到处向民众发表演讲，批评教会和保王党。不久，塔列兰当选为制宪议会主席。随后，塔列兰又同教皇发生了直接对抗。1790年8月24日，议会颁布《教士法》，规定主教和教士都由选举产生，取消首岁教捐等，并要求僧侣宣誓执行。罗马教皇大为震怒，不但不批准这项法令，反而发出了“谴责令”。塔列兰却反其道而